

## 薪資停滯？事實陳述與亞洲跨國比較\*

林常青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副教授

張俊仁\*\*

中央研究院  
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盧姝璇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副教授

本文根據總體經濟學的文獻，提出三個問題來了解臺灣勞工薪資的變化。首先我們用勞動所得份額的趨勢來討論勞動與資本所得分配是否惡化？第二，我們計算實質勞動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相關係數來討論勞動薪資是否與國民所得產生脫鉤的現象？我們不僅討論景氣波動，同時考慮成長趨勢下二者的連動狀況。第三，我們觀察薪資與邊際勞動生產力的差距與變化，探討廠商是否依據勞動生產力提供合理的勞動報酬？另外，為釐清這些薪資的問題是否為臺灣獨有，我們也將臺灣勞動所得結果之觀察與鄰近國家的現象做系統性的比較。

關鍵字：勞動生產份額、實質工資與國內生產毛額共變性、工資與生產力差距

---

\* 我們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使本篇論文更臻完善。另外，我們感謝林雪瑜與王偉能對本文的幫忙，清華大學經濟系助理陳莞琳、范玉儀、蕭宇喬、李岳晉的資料收集和整理，成功大學經濟系助理楊上緯和清華大學經濟系助理簡元佑文書上的協助。

\*\* 通訊作者，E-mail: jjchang@econ.sinica.edu.tw

收稿日期：105年1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105年12月8日

## 壹、緒論

臺灣的薪資停滯嗎？不同於一般報章簡單的報導，這篇文章將以總體經濟學的角度檢視這個問題，以期對當前「薪資停滯」的困境有更清楚的了解。<sup>1</sup>

薪資停滯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不可能歸因於任何一個單一理由。一般臆測可能的原因包含臺灣對大陸的高依存度及三角貿易、全球化的影響、高等教育的普及、工會力量的薄弱等。<sup>2</sup> 在稀少的文獻中，黃登興等（2014）透過與大陸貿易所造成的要素均等化，解釋臺灣薪資停滯的原因。<sup>3</sup> 陳香如與郭哲瑋（2014）則透過人力資源及高等教育的普及，探討實質工資停滯之可能成因。Haepf and Hsin（2016）則估計臺灣勞工之邊際生產力以解析工資停滯的原因，發現臺灣勞工的薪資與其生產力的差距不是非常明顯。整體而言，較年輕勞工的薪資較可能低於其勞動生產力，但是薪資有利於高中畢業但年紀較長的勞工。詹建隆（2011）及李長泰與方俊德（2015）則發現：較高生產力的勞動者，其薪資的成長率更可能低於本身生產力的提升率。劉碧珍等（2014）則以製造業為例，說明臺灣之勞動所得份額已於 1990 年代之高峰後開始反轉下跌。

有鑑於薪資停滯的複雜性，本文的目的將不在於提供臺灣薪資停滯的單一理由，而是依據總體經濟理論文獻上工資相關議題的發展，針對臺灣的困境提供一個清楚且有系統的探索，以全面性地觀察臺灣薪資停滯的現象。尤

---

1 「根據主計總處的薪資調查，包含月薪、年終獎金及加班費，臺灣的每月平均薪資近年來幾乎停滯，經物價指數平減後的『實質平均薪資』更呈現倒退，今年前 7 月的『實質平均薪資』46,786 元，與 1997 年的 46,646 元平分秋色。……臺灣自 2001~2012 年的經濟成長平均 3.72%，確實遠低於 1991~2000 年的 6.24%，更不如 1981~1990 年的 7.65%。據統計，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也由 1991 年的 28.8% 降至 2011 年的 20.2%，這說明 GDP 這塊大餅不像 10 年前成長的這麼快。儘管近 10 年經濟成長不如往日，但還是有成長，而成長的果實到底分配到哪裡？」（于國欽，2013）這些報導似乎指出臺灣正處於不利的困境——「薪資停滯」。

2 葉懿倫（2011）以製造業為其分析主軸，發現許多產業於 2006 年前後期間擴大海外生產比重。在此同時，其受僱員工平均薪資增加幅度也相對較高，藉此推論三角貿易可能非薪資停滯之主因。

3 黃登興（2015）進一步從全球化與兩岸貿易的關係解析臺灣薪資停滯現象。

其重要的是，我們將臺灣的狀況與亞洲鄰近國家互相比較（包含其他亞洲四小龍、較成熟的日本以及近十年新興的中國大陸），以瞭解臺灣薪資的狀況是否為亞洲普遍之現象或是臺灣特有之情況。這些綜合性的觀察以及系統性的比較不但可以讓我們在高度競爭的國際市場中知己知彼，就總體經濟的角度來說也十分重要，因為「資料陳述」以及「議題的呈現」將提供我們未來進一步研究的重要題材。

本文將依據總體經濟學中與工資有關的三個重要議題作為主軸。<sup>4</sup> 第一，我們將討論生產要素的所得分配，研究重點將著重於近年來勞動生產份額（labor income share）的趨勢與變化。Krueger（1997）提到要素份額可供使用在以下三方面：(i)描述所得的分配狀況，(ii)估計要素在總合生產函數的重要性，(iii)推論勞工與廠商間盈租（rent）的分配。儘管它是如此重要，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所得分配卻長期地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或總體經濟學家所忽略。主要的原因在於，學界普遍認為所得在兩要素間的分配呈現長期穩定的狀態。Keynes（1939）觀察英國及美國的數值發現，長期而言，不管產出與貿易循環階段的水準為何，勞動所得份額皆呈現穩定狀態。「對於英國與美國而言，這是經濟統計範疇中一個令人驚奇卻確切的事實。」<sup>5</sup> Kaldor（1957）依此廣為接受的事實（stylized facts），進一步建立了所得的要素份額長期間不變的觀點。<sup>6</sup>

4 本文所採用的薪資資料，盡量採用同一資料庫，以減少計算基礎不同的問題。當資料來自不同資料庫時，我們則選擇未含勞動福利的薪資資料；如此，各國間的薪資計算不會因勞工福利不同而存在基礎不一致的問題，以期望在同一基礎上做跨國的薪資比較。另外，礙於資料取得的限制，我們觀察製造業的資料特徵，確認考量勞動福利（指非薪資所得，如全民健保）不影響本文的結論。

5 原文為‘This is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yet best-established, facts in the whole range of economic statistics, both for Great Britain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6 要素份額的穩定性對於現代總體經濟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一方面，勞動份額與資本份額的平均已經常被用來模擬（calibrate）理論總體經濟模型範疇中的靜止均衡特質；另一方面，要素份額也在總體趨勢與景氣循環的現代實證特性中扮演重要角色。舉例來說，Gollin（2002）強調，要素份額的長期穩定性已神聖地成為一個廣為接受的事實。建構在此一認知上，Solow（1957）和 Prescott（1998）利用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推導出的固定比重來加總資本成長與勞動成長的概念，可證明總合成長主要來自總要素生產力（TFP）之改善。

然而最近資料卻顯示，勞動份額自 1980 年代早期已經開始有下降的趨勢。有鑑於這個發現，勞動與資本所得份額的分配議題又再度受到關注。圖 1 很快地指出我們的勞工在所得分配上的劣勢。雖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國家的勞動份額也同樣有下滑的趨勢，但臺灣的勞動所得份額在絕對水準以及下滑幅度上都較 OECD 國家嚴重。為了解這現象是否為臺灣獨有的狀況還是亞洲國家共有的特性，本文將針對這個面向做深入的探討，並提出中肯的事實陳述。

第二，我們將討論實質工資與實質國民生產毛額之連動性 (co-movement)。這個議題呼應「經濟成長與實質薪資脫鉤的可能」。雖然大部分的重要總體經濟變數 (包含消費、投資、就業) 都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呈現順循環 (pro-cyclical)，然而，實質工資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連動關係卻沒有定論。舉例而言，Solon et al. (1994)、Hart et al. (2003) 以及 Kandil (2005) 均發現，在景氣循環中美國的實質工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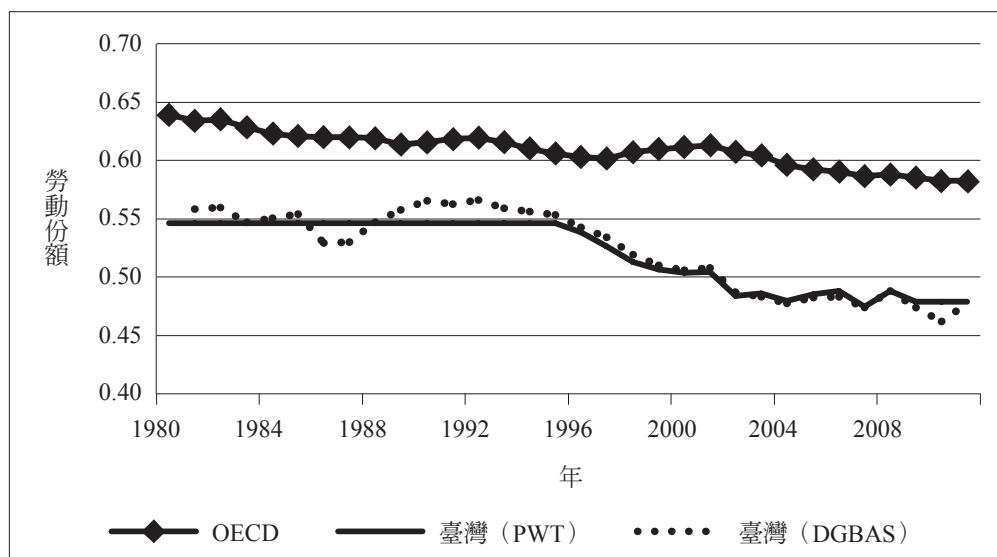


圖 1：OECD 與臺灣的勞動所得份額

資料來源：OECD 勞動份額的資料來源為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8.0 (PWT8.0) (Feenstra et al., 2015) 中 OECD 國家 (於 1980 年後有完整資料之國家) 總勞動要素所得對總生產毛額之比率；臺灣的勞動份額 (圖中實線) 亦來自 PWT8.0，另因該數列於 1995 年之前為固定，我們亦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5) 所提供之國內生產及要素所得之數值計算勞動份額 (圖中虛線)。

其國內生產毛額為正相關。Gärtner (2009: 446) 針對加拿大的經濟，卻有完全相反的發現。Messina et al. (2009) 則針對 OECD 國家做一個大規模的跨國比較。他們的證據顯示：僅有德國以及日本兩個國家，工資與國內生產毛額的連動呈現一致性的正相關。在不同的計算方法下，英國與美國大致也呈現二者為正向相關的連動性。然而，法國與瑞典則可能因計算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令人驚訝的是，不少國家，例如加拿大、西班牙、紐西蘭與愛爾蘭，他們的實質工資與國內生產毛額呈現非常一致性的負相關。

圖 2 概括性地描繪臺灣實質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關係。我們不難發現工業及服務業實質平均薪資在 2000 年後大致呈現停滯甚至下滑的趨勢。此趨勢和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趨勢大不相同。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在 1980-2007 年大致呈上漲趨勢，並在 2007 年後變動才和實質平均薪資較為一致。雖然如此，此段期間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卻超過工業及服務業平均薪資。臺灣的實質平均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呈現

實質薪資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基準年：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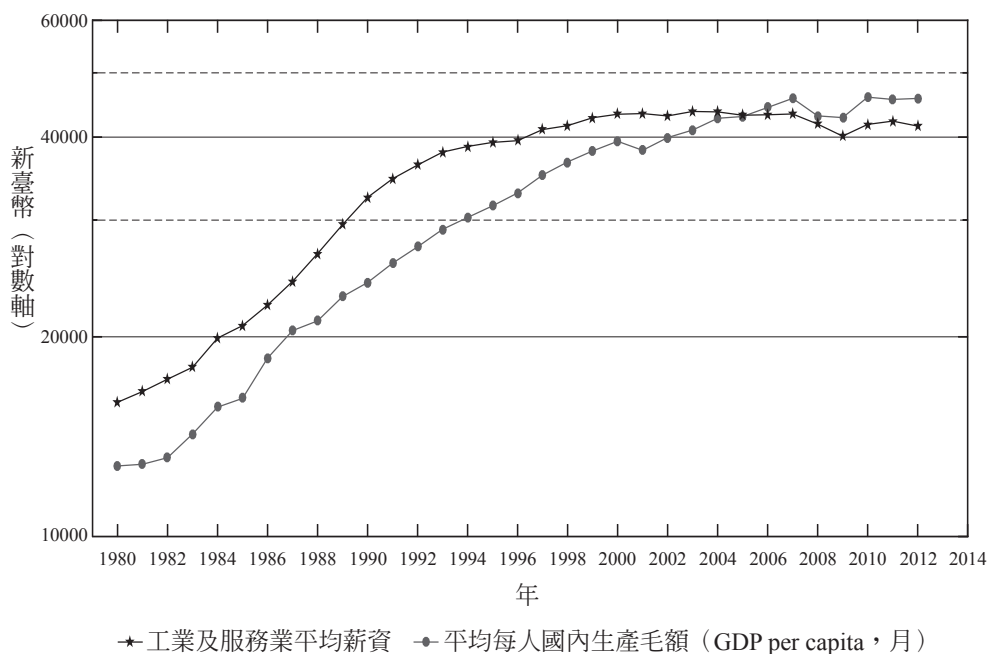


圖 2：臺灣實質薪資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1980-2012

資料來源：原始資料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3a; 2013b)，再經本研究加以計算。

何種互動呢？相對於其他國家二者的互動性強嗎？抑或此互動為非對稱性，景氣好時二者互動弱，但景氣低迷時卻呈現高度相關？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分別計算時薪與平均薪資對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相關係數，藉此提供進一步系統性的分析與探討。

第三個我們想討論的問題是臺灣的勞工貢獻是否得到適當報酬？為此，我們將探討「工資與勞動生產力的差距」（the gap between marginal productivity and wages of workers）。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例如 Becker, 1975 及 Lazear, 1979）已經意識到工資與勞動生產力之間可能存在缺口。可惜的是，既存的文獻並沒有針對臺灣與亞洲鄰近國家的實際情況，提出清楚的報導與說明。資料顯示，大約在 1995 年後臺灣的工資與勞動生產力已經產生不一致的現象，而且此一差異似乎有日漸擴大的趨勢。<sup>7</sup> 在高度自由化的國際競爭市場，我們的競爭對手也面臨相同的難題嗎？於是我們更進一步討論，相對於鄰近的其他亞洲國家，臺灣的資方是否更虧待勞工？而跨國的比較將有助於我們釐清這一觀點。最後，我們將探究臺灣不同產業的薪資走勢，了解為何臺灣大眾感受到薪資停滯。

## 貳、資料說明

為分析上述問題，本文針對臺灣，並與香港、新加坡、韓國及日本等國進行跨國比較。資料涵蓋消費者物價指數、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就業人數勞動所得份額、平均獎金紅利與加班費、平均薪資、平均每小時薪資、匯率與每年平均勞動工時等。各國詳細資料來源，彙總於表 1。所有變數的平減指數皆採用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物價調整指數。臺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原為 2006 年 = 100，經轉換以 2005 年 = 100；香港 1980 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資料是由 Datastream（2014）而來，在 Datastream 中香港 CPI 是以 2000 年為基期，後經轉換以 2005 年 = 100。

7 詳細分析請見圖 8。雖然在 1990 年之前月均薪資的變動亦與邊際勞動產出的變動不一致，但當時邊際勞動產出的成長較近 20 年來快速，且該成長幅度不一的現象在 1980 至 1995 年間逐漸改善，並趨於一致，故較不易察覺問題的存在。

表 1：各國詳細資料來源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消費者物價指數	AREMOS	1980：HKXCPL.* 1981-：AREMOS	AREMOS	AREMOS	AREMOS
國內生產毛額	主計總處	World Bank	World Bank	World Bank	World Bank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年：TWWOGPCPA* 季：主計總處	HKWOGPCPA*	SPWOGPCPA*	KOWOGPCPA*	JPWOGPCPA*
就業人數	年：TWWOLE..P* 季：TWXEMPT.P*	HKWOLE..P*	SPWOLE..P*	KOWOLE..P*	JPWOLE..P*
勞動所得份額	PWT8.0	PWT8.0	PWT8.0	PWT8.0	PWT8.0
平均獎金紅利與加班費	TWCOMEMP*	HKWDQTYWA*	SPWDQTYWA*	KOCOMEMP*	JPAUWCD.*
平均薪資	總體：TWWAGES.A* 部門：主計總處	HKSARA..*	SPWAGES.A*	KO0AD003A*	JPWAGES.A*
平均每小時薪資	TWXWAG\$.*	HKXWAG\$.*	SPXWAG\$.*	KOXWAG\$.*	JPXWAG\$.*
匯率	TWXRXD..*	HKXRXD..*	SPXRXD..*	KOXRXD..*	JPWD8HA5A*
每年平均勞動工時	PWT8.0	PWT8.0	PWT8.0	PWT8.0	PWT8.0

註：AREMOS—臺灣資料來自台灣經濟統計資料庫（TW），其他國家來自 IMF 國際金融統計（IFS）資料庫（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2014a；2014b）；World Bank 係指世界銀行資料庫（The World Bank, 2014）；PWT8.0 係指 Penn World Table (PWT) version 8.0 (Feenstra et al., 2015)；至於其他最後以 \* 結尾之名稱皆為 Datastream (2014) 的變數代號。

各國平均每小時薪資（以下簡稱為時薪）的原始資料為美元計價，為了控制當地物價水準，我們將之以匯率轉換成本國幣，再採用該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將名目時薪轉為實質時薪。<sup>8</sup> 另外，韓國的平均薪資為總體的薪資所得除以受僱人數。在計算邊際勞動產出時，我們以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為基礎，藉此利用勞動所得份額乘以平均勞動產出推算邊際勞動生產力。<sup>9</sup>

8 且後續跨國比較，大多以比例、相關係數，或是各國之變動趨勢加以說明。

9 在本文邊際勞動生產力定義為  $MPL = (1 - \theta) \times \frac{\text{output}}{\text{employment}}$ ，其中  $\theta$  為隨時間改變的勞動所得份額。

## 參、勞動所得份額

最近的資料顯示，對大多數的國家來說，勞動份額自 1980 年代早期已經開始有下降的趨勢。有鑑於這個發現，勞動與資本所得份額的分配又再度成爲受重視的議題。近來關於勞動與資本所得份額的實證研究打破了過去「要素份額固定」這已知的經濟特徵事實。勞動所得份額的減少不只出現在已開發國家（有關 G-7 國家見 Krämer, 2011，OECD 國家見 Guscina, 2006，歐洲國家見 Arpaia and Pichelmann, 2008），也出現在開發中國家（有關拉丁美洲國家見 Diwan, 2001，低所得國家與低中間所得國家見 Maarek, 2012）。一般而言，他們的證據顯示，勞動份額在 1970 年代晚期或 1980 年代早期達到高峰，隨即呈現下滑狀態。相對於 30 年前的水準，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的勞動所得份額大致上減少了 10%（Krämer, 2011）。有趣的是，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勞動份額減少的狀況與已開發國家的情況雷同（Maarek, 2012）。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4）普遍性地調查 59 個國家，發現勞動所得份額呈現全面性的下降（global decline）：過去的 38 年（1975-2012），平均勞動所得份額至少減少了 5% 以上，39 個國家呈現統計上顯著的下降，僅 9 個國家的勞動所得份額是上升的。這些證據顯示，勞動所得份額的遞減似乎是一個全球普遍的現象，而並非臺灣所特有。

針對我們鄰近的亞洲國家，圖 3 顯示，過去 17 年間（1995-2011 年），亞洲四小龍中只有香港的勞動所得份額上升了 7.68%（從 1995 年的 0.4906 上升至 2011 年的 0.5283），而新加坡、南韓與臺灣的數值卻下降：新加坡的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了 0.18%（從 1995 年的 0.4402 下降至 2011 年的 0.4394），南韓的勞動所得份額下降 5.48%（從 1995 年的 0.5771 下降至 2011 年的 0.5455），臺灣更下降了 12.40%（從 1995 年的 0.5462 下降至 2011 年的 0.4785）。雖然臺灣的勞動所得份額的下降幅度是亞洲四小龍中之最，但是如圖 3 所顯示，日本與中國大陸也不遑多讓。過去 17 年來，日本的勞動所得份額也下降 7.64%（從 1995 年的 0.5671 下降至 2011 年的 0.5238），而中國大陸更下降 23.35%（從 1995 年的 0.5465 下降至 2011 年的 0.4189）。值得一提的是，勞動所得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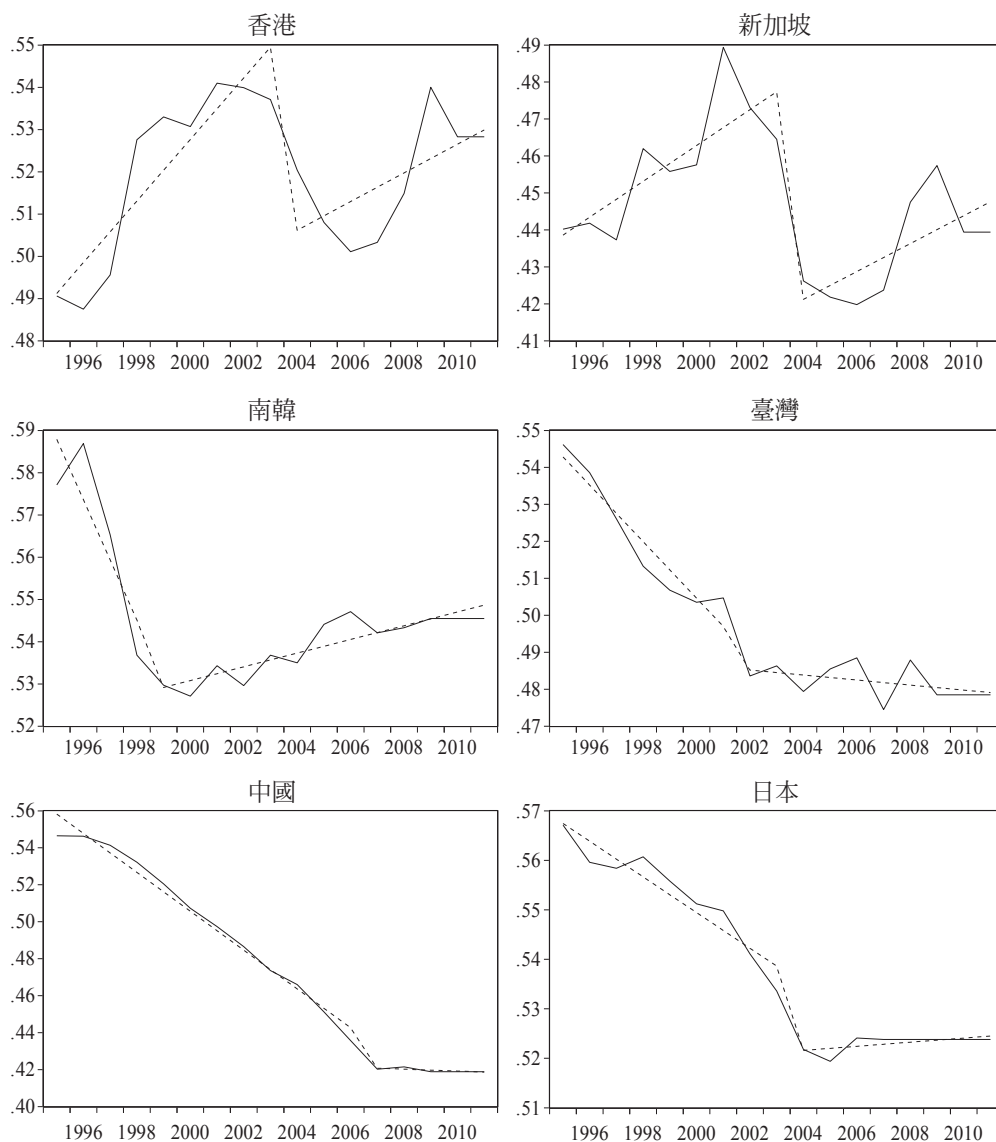


圖 3：亞洲各國勞動所得份額

註：實線為實際資料，虛線為趨勢線，截距與時間趨勢上改變的時點係以 Bai and Perron (1998; 2003) 的方法，檢定而得。

額的下降除了表示在薪資方面勞工變得更弱勢外，也可能是因為產業結構轉型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所造成的自然結果，中國大陸近 30 年來勞動所得份額大幅下降即可能是一例。一般認為 (見張車偉、張士斌，2012 及 Qi, 2014)，中國大陸的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主要來自改革期間 (1978 年至今)

的產業結構轉型，由農業部門轉型至服務及製造業（農業部門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由 28.2% 下降至 10%，服務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由 23.9% 增加至 43.4%），而工業大致維持在 45% 上下。

若進一步細看鄰近亞洲各國勞動所得份額的變動，則可以發現新加坡勞動所得份額的趨勢自 2004 年起逐漸升高；南韓的勞動所得份額則自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緩慢上升；香港的勞動所得份額則是在 2003 年驟降之後，自 2004 年逐漸回升，到 2009 年才大致回到 1998 年的水準；而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則呈現下滑走勢。<sup>10</sup>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自 1995 年開始勞動所得份額即快速下降，到 2002 年下降才見趨緩；中國大陸則於 1998 年急速下降，2007 年起有緩和的趨勢；而日本的勞動所得份額自 1995 年起持續下降，其趨勢到 2004 年之後才逐漸平緩。

整體而言，當經濟體系面臨轉型時，則可能產生勞動所得份額的改變。由於各國產業轉型的時間點與方向不同，也致使各國有不同的發展趨勢。劉碧珍等（2014）也發現相同的因素在早期與現在（貿易開放程度與技術進步）對勞動所得份額的影響可能不一致。至於為何臺灣勞動所得份額有下降的趨勢，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複雜的原因所造成的。粗略而言，當臺灣從一開始的勞動密集越來越偏向資本擴張的成長，貿易的開放有利於 1990 年代前臺灣的勞工，1990 年代之後卻反而有利於資本家，再加上這幾年來眾多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才造成臺灣勞動所得份額一路下降。

香港與新加坡的勞動份額逐步上升的趨勢則可能是因其為城市國（city state），經濟結構的改變傾向勞動密集性產業發展，這些勞力密集產業的擴張提升了其勞動所得佔總產出的比例。就香港而言，經濟成長四大支柱：貿易與物流服務業、金融保險業、專業服務業（包含資訊技術、會計與法律等）及觀光旅遊業，不但支撐了香港半數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合併國內生產毛額貢獻由 2002 年的 50.8% 到最高點 2007 年的 60.3%），也容納了大量的勞動人口。尤其是，觀光旅遊業為 2002 至 2012 年間成長最多的經濟支柱，形

---

10 雖然研究期間的勞動所得份額多有波動，但因本文較著重於長時間的大趨勢，故僅將重點放在期初與期末的比較。

成勞動所得份額上升趨勢的原因（見 Research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5）。新加坡則以引進新產業的方式創造人口就業並促進經濟成長，這些新產業包含資訊技術業、生技業及博弈與觀光業。資訊技術與生技產業設計等所謂創意產業的就業人口佔總就業比例約 4%，博弈觀光業則為新加坡帶來 3.5 萬個就業機會，國際旅客由 2006 年的 970 萬人次增加至 2015 年的 7,000 萬人次。這些產業不但增加就業人數，同時也增加勞動所得份額（見 Heng et al., 2003）。1995 至 2011 年間，南韓勞動所得份額減少 5.48%，依據 Hwang（2015）的說法，自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的製造業比重大幅增加且傾向相對資本密集，勞動所得份額也因此而減少。

## 肆、實質薪資與國內生產毛額

文獻中對於實質薪資的變動是順景氣循環或逆景氣循環仍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根據既有文獻運用美國資料得到的結果顯示，實質薪資與國內生產毛額呈同向變動的關係（參見 Barsky and Solon, 1989; Solon et al., 1994; Hart et al., 2003 及 Kandil, 2005）。Gärtner（2009）及 Messina et al.（2009）則提出實質薪資在實證上也有可能呈現逆景氣循環的特性。<sup>11</sup> 針對這個現象，本章將觀察臺灣以及臨近的亞洲各國。因我們較著重社會平均每人的生活水準而非整體經濟的表現與實質薪資的關係，而平均每人的生活水準又多以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衡量，故我們觀察實質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共同變動的程度。<sup>12</sup> 另外，就實質薪資的部分，我們觀察兩類薪資數據：時薪（4.1 節）及平均薪資（4.2 節）。前者比較接近經常性薪資的變化，後者比較接近總薪

11 舉例來說，Kandil（2005）發現加拿大的實質薪資呈現逆景氣的特性。另外，Messina et al.（2009）採用三種物價平減指數，研究 18 個 OECD 國家，發現不論採用哪一種物價平減指數，德國與日本的實質薪資都呈現順景氣的特性，而加拿大、西班牙、紐西蘭及愛爾蘭則一致呈現逆景氣的特性。其他國家實質薪資與景氣循環共同變動的關係，則和所選擇的物價平減指數有關。

12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較能夠反映平均每人的生活水準，故藉由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來觀察平均每人的生活水準。此外，我們也針對 GDP 與薪資的關係做相似的討論。結果顯示，正負號的方向性相同，僅數值不同。

資的變化。<sup>13</sup>除了景氣波動外，我們也觀察薪資與成長趨勢的相關性。

本文將使用這兩種不同定義的實質薪資探討薪資和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在「成長趨勢」及「景氣波動」的關係。其中，時薪反映的是基本的薪資水準；平均薪資則包含了紅利、獎金及加班費，係為隨景氣調整後的薪資水準，較能貼近人民的感受。為了解實質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連動的關係，本文觀察臺灣及亞洲其他四國（日本、香港、韓國及新加坡）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在景氣波動及成長趨勢連動的關係。就景氣波動的連動性而言，我們觀察此二變數景氣循環部分（cyclical component）的相關係數；就成長趨勢的連動性而言，我們觀察此二變數成長趨勢（trend component）的相關係數。本文利用 Hodrick-Prescott filter 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時薪與平均薪資等經濟變數分別拆解為兩部分。該方法為總體經濟分析中常用來消除景氣波動以獲得平滑趨勢（smoothed trend component）的統計方法。本文中所謂的成長趨勢即為利用該方法所得到的平滑趨勢，而景氣波動即為實際值與平滑趨勢的差距。<sup>14</sup>時間方面，我們選擇 1980-2012 年為全時期，但香港與新加坡因為資料限制而全時期不同：香港為 1983-2012 年；新加坡則是 1989-2012 年。另外，我們選擇觀察 2001-2012 年為近期，選擇此一時間點乃因臺灣的薪資在 2001 年有一結構性的轉折，因此我們欲探討 2001 年後各國是否和臺灣一樣有類似的轉折。<sup>15</sup>

## 一、時薪

實質時薪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連動性彙總於表 2。一般而言，實質時薪景氣波動（即去除趨勢後的部分）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景氣波動的相關係數，低於實質時薪趨勢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趨

---

13 本文認為時薪較接近經常性薪資的特性是因為時薪為單位小時薪資，比較接近經常性薪資基礎薪資的概念。另一方面，平均薪資是總薪資的概念，相較於時薪更容易受到非經常性薪資的影響。

14 在本文中，Hodrick-Prescott filter 的平滑參數設為 100。

15 我們採用 Bai and Perron (1998; 2003) 的方法，檢定時間序列在截距與時間趨勢上的結構性變化。

表 2：實質時薪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景氣波動及成長趨勢上的連動性

	景氣波動					成長趨勢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全時期：1980-2012	0.34	0.49	-0.22	0.33	0.05	1.00	0.97	0.98	1.00	0.79
近期：2001-2012	0.52	0.34	-0.40	0.40	0.25	0.97	-0.99	0.97	1.00	-0.98

勢之相關係數。再者，實質時薪的趨勢的確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趨勢呈現高度相關。若進一步查看，全時期（1980-2012 年）中臺灣的實質時薪趨勢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趨勢的連動性與其他大部分國家（或地區）並無不同，均呈現高度相關；但日本的相關係數偏小（0.79）。相反地，香港與日本在近期（2001-2012 年間）兩者趨勢之相關係數為負。

然而，當我們專注於實質時薪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除去成長趨勢後的）短期景氣波動的共變性時，我們可以發現實質時薪較不容易隨著短期之景氣變動而調整。在我們所觀察的五個國家中，相關係數均小於 0.53。這個偏低的相關係數，符合一般總體經濟學家的估計（見 Huang et al., 2004 以及 Messina et al., 2009）。其中，新加坡似乎是個特例，雖然實質時薪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的成長趨勢呈現高度相關，但是兩者的景氣波動卻呈現負向關係。相反地，臺灣似乎與香港、韓國以及日本沒有多大的不同。臺灣之實質時薪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隨景氣波動的相關係數在 1980-2012 年間為 0.34，在近期（2001-2012 年間）反而較大（0.52）。

## 二、平均薪資（含非經常性薪資）

一般而言，所謂平均薪資包含分紅、加班費等現金或非現金的報酬，各國的平均薪資則因資料來源不同而略有差異。<sup>16</sup> 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連動性彙總於表 3。相對於時薪，由於平均薪資為包含獎

16 臺灣的平均薪資包含加班費及任何形式的報酬。香港的平均薪資為實質薪資指數，其數值所採用的薪資資料為包含底薪、生活津貼、承諾給付之獎金、小費及佣金。新加坡的平均薪資包含獎金但不包含社會安全基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之支付。韓國的平均薪資為總體之薪資支出除以受僱人數。日本的平均薪資為總現金薪資（包含契約訂定及特別所得）。

金、紅利及加班費的平均總收入，考量此一指標可能更能貼近民眾的感受。就全時期（1980-2012年）而言，如同上小節討論時薪的結果，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的趨勢連動性比兩者的景氣波動連動性更強。當我們先撇開長期趨勢而專注於兩者短期景氣波動的關聯性時，如表3顯示，臺灣的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景氣波動的相關係數在全時期（1980-2012年）為0.51，近幾年（2001-2012年間）則擴大為0.79。尤其，在景氣波動中二者的互動性，臺灣與日本呈現最類似的型態。

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成長趨勢的互動關係時，可以發現長期而言（全時期之1980-2012年），二者的互動不但相當密切，而且各國（包含臺灣）都非常類似。然而，就近十年而言（2001-2012年），臺灣與香港的情勢已悄悄地發生變化：臺灣與香港之實質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呈現負相關（臺灣之相關係數為-0.99，而香港為-0.22）。這表示成長趨勢下，近十年來臺灣的實質薪資與衡量經濟成長之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確呈現「背道而馳」的趨勢。

依據Lu（2012），1980年後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或變動，主要來自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理論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較高的國內產出將帶動勞動生產力提升以及勞動需求的增加，這將有利於實質工資的上升。然而，依據黃登興等（2014）探究臺灣與香港薪資停滯的成因，指出臺灣及香港之所以產生較明顯的薪資停滯現象，主要原因在於臺灣及香港高度與中國市場相依，因而更早且更容易為中國大陸的低薪所牽絆。

表3：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景氣波動及成長趨勢上的連動性

	景氣波動					成長趨勢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全時期：1980-2012	0.51	0.16	0.16	0.72	0.55	0.95	0.96	0.98	0.99	0.81
近期：2001-2012	0.79	0.48	0.86	0.18	0.61	-0.99	-0.22	1.00	1.00	0.99

\* 香港的全時期為1983-2012；新加坡的全時期為1989-2012。

這可能是造成薪資與國內生產毛額呈現背道而馳的原因。

當我們更深入觀察臺灣的部門資料，可以發現這個背道而馳的趨勢也出現在主要的工業及服務業兩個部門。表 4 顯示，就成長趨勢而言，儘管全時期（1980-2012 年）中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的相關係數皆為正值，但兩變數在 2001-2012 年間為高度負相關（工業：-0.87；服務業：-0.99）。這些現象似乎是臺灣民眾「薪資停滯」感受主要的來源。同時，這些證據也告訴我們，就全時期而言廠商的給薪並非沒有反映景氣的波動，然而 2001 年後薪資的確與所得成長趨勢相違背。

有鑑於成長趨勢下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連動更能反映民眾的感受，以下針對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的成長趨勢是否因景氣的好壞而呈現不同的連動性，做更深入的探討。在此，景氣的復甦期及衰退期係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定義。為了增加樣本的數目，提高資料的可信度，以下我們將採用季資料從事分析。

表 5 顯示，季資料的特性與年資料的特性相似。針對實質經常性薪資（行政院主計總處，2013c）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整體而言，實質工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呈現高度連動（不論是全時期、近期、所有衰退期或所有復甦期），然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以後，二者似乎呈現非常獨特的現象。在 2008 年第二季至 2009 年第一季的衰退期，工資與國內生產毛額呈現負的連動；而 2009 年第一季至 2012 年第四季復甦期，二者也呈現負向互動。

接著，我們討論包含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之實質平均薪資。首先，如表 5 所顯示，季資料再度確定年資料的結論：2001-2012 年實質平均

表 4：兩部門的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景氣波動及成長趨勢上的連動性

產業別	景氣波動		成長趨勢	
	工業	服務業	工業	服務業
全時期：1980-2012	0.5903	0.3920	0.9624	0.9353
近 期：2001-2012	0.8467	0.5412	-0.8753	-0.9995

表 5：衰退／復甦期間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兩者成長趨勢的連動性

	經常薪資	平均薪資
全時期：1980-2012	0.9946	0.9469
近 期：2001-2012	0.7446	-0.8500
所有衰退期	0.9979	0.9741
所有復甦期	0.9927	0.9263

#### 衰退期

	經常薪資	平均薪資
1980Q1-1983Q1	0.9991	0.9995
1984Q2-1985Q3	1.0000	1.0000
1989Q2-1990Q3	1.0000	0.9999
1995Q1-1996Q1	1.0000	0.9998
1998Q1-1998Q4	1.0000	1.0000
2000Q4-2001Q3	0.9994	0.9990
2004Q2-2005Q1	1.0000	-0.9917
2008Q2-2009Q1	-0.9986	-0.9931

#### 復甦期

	經常薪資	平均薪資
1983Q1-1984Q2	1.0000	1.0000
1985Q3-1989Q2	0.9986	0.9986
1990Q3-1995Q1	0.9993	0.9909
1996Q2-1997Q4	0.9998	1.0000
1999Q1-2000Q3	1.0000	0.9997
2001Q4-2004Q1	0.9967	0.9298
2005Q1-2008Q1	0.8391	-0.9600
2009Q1-2012Q4 (current)	-0.5964	-0.8760



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成長趨勢的連動性呈現負相關。

表 5 也呼應對近期工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呈現負向關係的看法。有趣的是，當我們考慮包含非經常性薪資之實質平均薪資時，二者更早呈現負相關的現象。就實質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者成長趨勢的連動性而言，兩變數間的負向連動似乎揭露出廠商更早透過非經常性薪資來反映他們的薪資決策：不論是經常性或平均薪資，近期臺灣的實質工資呈現僵固（停滯）的特性，不但不會隨國民所得提高而上升，反而可能呈現負相關的現象。

## 伍、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

為進一步探討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與實質薪資變動的脫鉤甚而停滯不前是否單純反映邊際勞動生產力的現實狀況，這一節我們將觀察實質薪資與邊際勞動產出的關係。以邊際勞動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來替代每單位勞動所得（wages）的概念在總體經濟模型中被廣泛使用。因此，薪資的變動在理論上反映邊際勞動產出的變動。但必須注意的是，此一關聯性會在勞動市場存在「均衡下既有耗損」（labor market friction）時被弱化。所謂的「均衡下既有耗損」包含勞動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最低工資的限制，以及反映異質的勞動力等勞動市場與模型假設不符的現實。所以，我們觀察亞洲各國實質薪資與邊際勞動產出是否產生分離的現象；這也能夠看出臺灣廠商是否給予勞工合宜的報酬。

同上一節，我們針對不同的薪資定義（時薪及平均薪資）討論薪資與邊際勞動生產力的關係。必須注意的是，本節所述之薪資皆為實質薪資，邊際勞動生產亦是實質的概念。

### 一、時薪

首先，我們觀察鄰近各國（日本、香港、新加坡與韓國）的情況。圖 4 表示，1990 年代中期以後，南韓與新加坡時薪的成長明顯高於其邊際勞動生產力的成長。日本的時薪約在經過 1996 年較大幅度的成長後，也超過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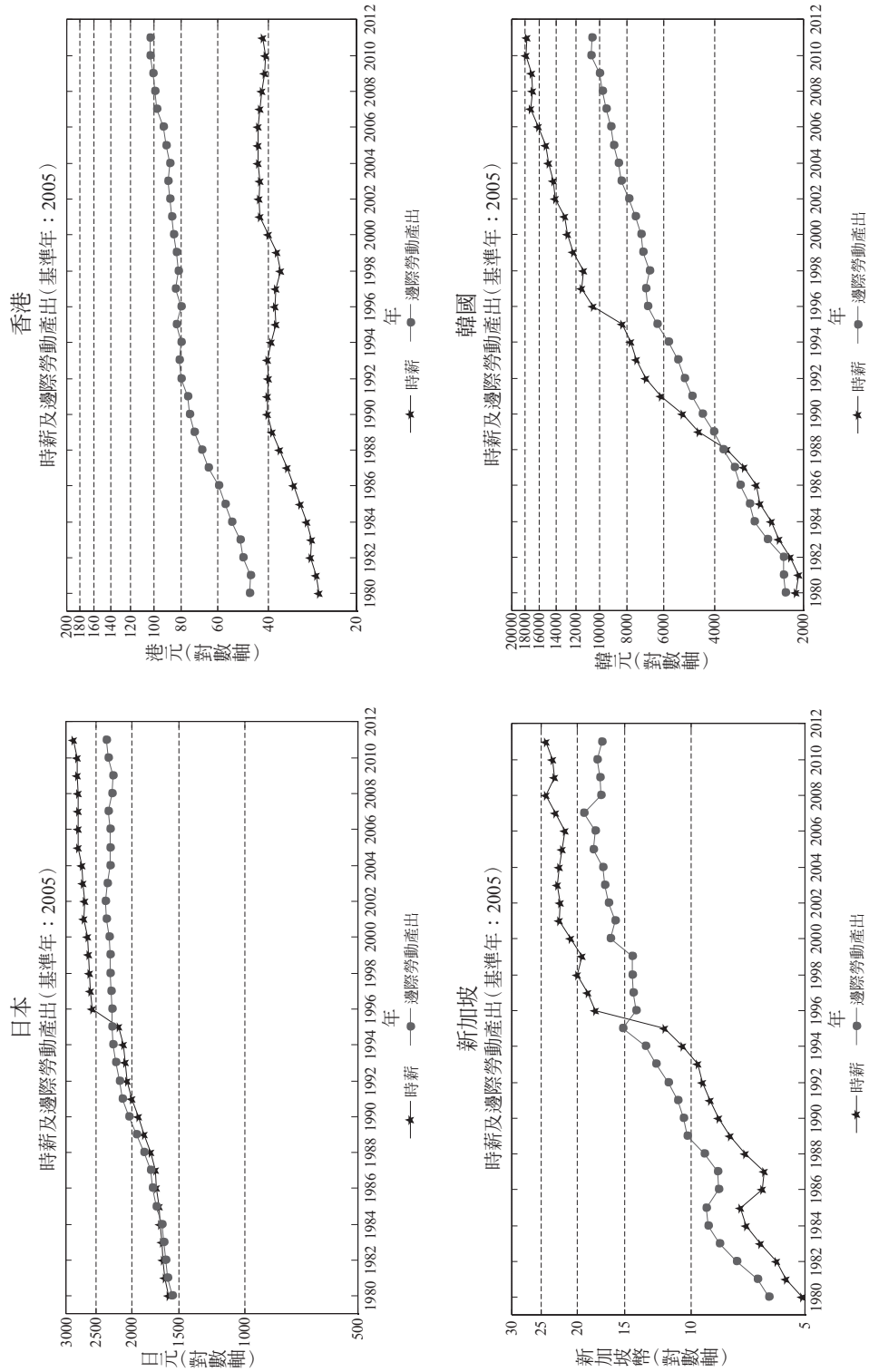


圖 4：四國時薪及每小時邊際勞動產出

勞動生產力（雖然在 1990 年代後二者的變化都不太明顯）。<sup>17</sup> 在這個議題上，香港顯得特別不同：雖然勞動生產隨著時間的經過逐漸成長，然而其時薪卻似乎裹足不前，造成二者的差距愈來愈大。

韓國於 1988 年前時薪略低於邊際勞動生產力，此一現象在 1989 年後隨時薪的大幅成長而有所改變。更仔細地觀察，我們可以發現時薪的快速成長在 1986-1987 年間已經發生（斜率變陡）。根據 Yoon（1999）之論點，韓國的罷工運動在 1987 年之前較為溫和，在 1987 年之後則強度大幅增加。如同 Ro（1995）的看法，1987 年之前韓國政府默許企業壓低薪資以利經濟成長；然而，在 1987 年後韓國罷工運動興起，使工會談判力量增強，因此工資的成長率大幅提升，並且超過勞動生產力的成長（依其估計 1987-1992 年間，工資成長率為 20.86%，而勞動生產力成長率為 19.54%）。<sup>18</sup>

---

17 Ilmakunnas and Maliranta（2005）採用模型估計薪資與生產力之差距（wage-productivity gap），發現邊際勞動產出低於薪資與邊際勞動產出高於薪資的狀況並存。對於薪資高於邊際勞動生產力的現象，理論文獻透過「人力資本說」、「效率工資理論」或「市場競爭條件說」解釋高工資的可能。Mincer（1974）及 Becker（1975）的人力資本說認為，為反映人力資本的貢獻，工資將因勞工年資的增加而增加。根據 Yellen（1984）與 Akerlof and Yellen（1990）所提的效率薪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資方為解決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員工怠工（shirking）及職訓成本（turnover rate）等問題，因而有動機支付高於邊際生產力的薪資。市場條件則著重於工會對於高工資的要求（Zavodny, 1999）。另外，當資方在勞動市場具買方壟斷力（monopsony）時，邊際勞動產出就會大於薪資。

18 如同本節一開始所陳述，傳統經濟理論強調在勞動市場均衡下邊際勞動生產力（ $MP_L$ ）必須等於其工資（ $w$ ）。然而，這個理論上的推測並不符合實際資料。如同 Mankiw（2006）的說明，這個理論建立在許多強烈的假設下，例如：完全競爭的勞動及產品市場、齊質的勞工生產力與廠商能力、無員工流動成本（employee turnover cost），以及  $MP_L$  計算忽略人力資本無形投入（如員工情商及對意外事件的反應能力）的貢獻。一旦這些假設放寬後， $MP_L \neq w$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 $w > MP_L$  的狀況，並不一定代表廠商長期以來存在負利潤。在不完全競爭的環境下（不完全競爭是一個常態），假設廠商的利潤（ $\pi$ ）= 總收益（TR）- 總成本（TC）（包含勞動及資本成本），則只要廠商的投資（資本）報酬率夠高，使得總收益（TR）提升，即使  $w > MP_L$ ，廠商仍是有利可圖。這個情況在景氣較好、廠商的投資（資本）報酬率較高，或者廠商之員工流動成本很大的狀況下尤其可能出現。此外，勞動生產力以及廠商能力的異質性也顯示平均之  $w > MP_L$  不代表所有的廠商對於勞動的投資均處於虧損的狀態，在實務上，要素的貢獻是無法切割的。如同 Haepf and Hsin（2016）認為，比較好的解釋是，當  $w > MP_L$  表示在工資談判上，勞方（工會）較為強勢；相反地， $w < MP_L$  則顯示出資方（廠商）較具有強勢力量。顯然，各國的勞動及廠商異質

對臺灣的勞工而言，近年臺灣每小時薪資與邊際勞動產出的關係，略優於香港，但不如日本、新加坡及韓國。圖 5 顯示，在 1980-1996 年間臺灣的時薪大幅低於邊際勞動產出，在 1996-2011 年間時薪則以略低的水準與邊際勞動產出亦步亦趨（2008 年除外）。此一情況是最符合經濟理論上的看法——時薪等於邊際勞動生產力——時薪與邊際勞動生產力之間似乎並無脫鉤的現象。然而，我們必須了解總體資料中二者的一致未必表示勞工完全受到合理的對待。針對不同教育程度的研究，Haepf and Hsin（2016）指出，(i)在臺灣勞工薪資與其生產力的差距不是非常明顯，甚至有利於高中畢業但年紀較長的勞工，且(ii)愈年輕的勞工愈容易受到資本家不合理的薪資對待（薪資低於其勞動生產力）。

圖 6 則列出五國之時薪對勞動生產力比。透過該圖我們可以歸納得知：與日本類似，臺灣的時薪對勞動生產力比，除了在 1990 年代中期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其餘期間似乎是停滯的。相反地，韓國與新加坡卻在 199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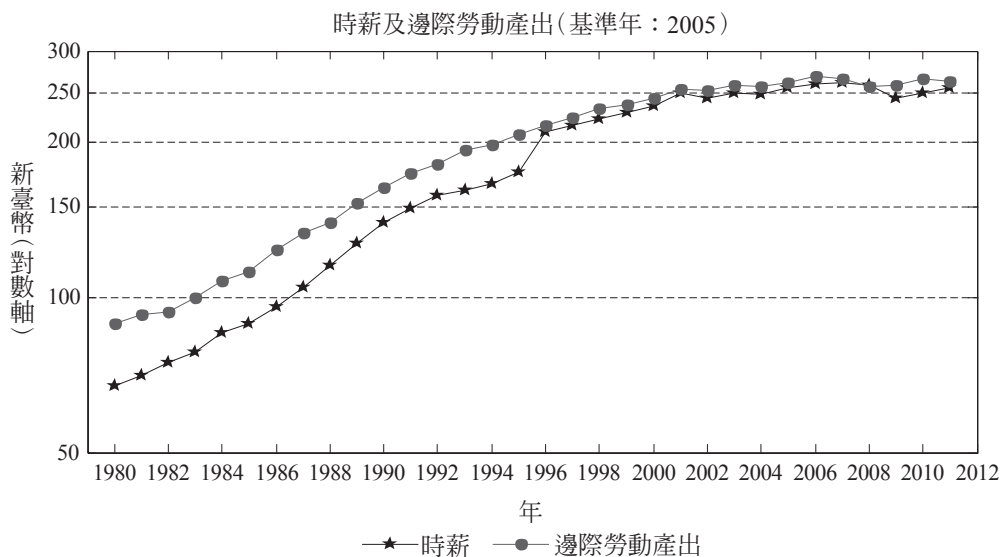


圖 5：臺灣時薪及每小時邊際勞動產出

狀況不同、市場結構不同、面臨的經濟狀況也不盡相同，無法完全控制這些變數。然而，只要估計方式一致，跨國的相對比較還是可以提供不少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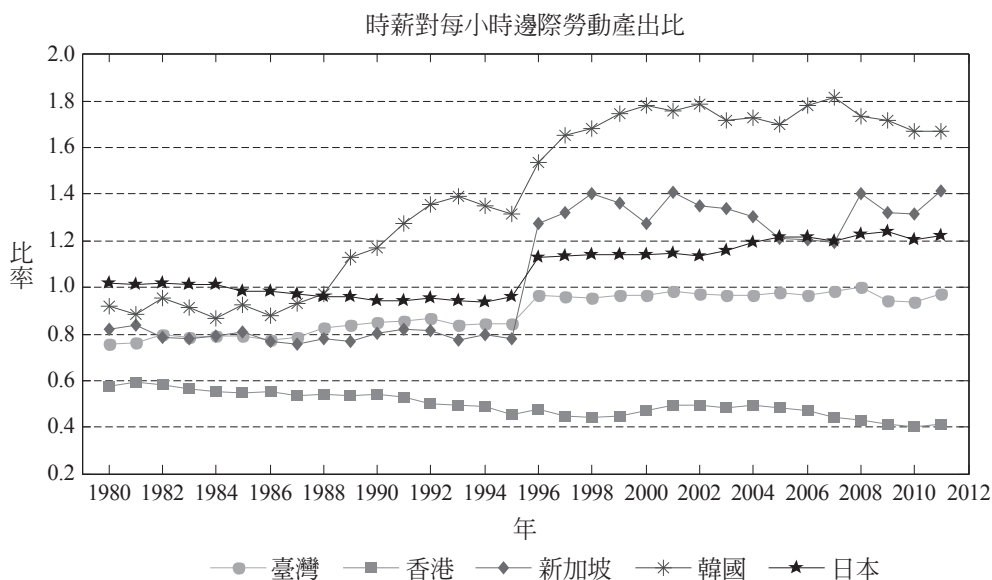


圖 6：五國時薪對每小時邊際勞動產出比

以後均呈現上揚的走勢。當然，香港的勞工則遭遇時薪對勞動生產力比值一路走跌，且時薪落後勞動生產力的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 二、平均薪資（含非經常性薪資）

當我們將薪資的討論由以小時為單位的時薪擴大為包含獎金及紅利等非經常性薪資之月平均薪資，則情況稍有不同。<sup>19</sup> 圖 7 顯示，香港的狀況還是一樣，邊際勞動生產力仍高於其月平均薪資，且差距有擴大的趨勢。韓國與日本則呈現相反的態勢。然而，就月平均薪資而言，新加坡與臺灣（見圖 8）則呈現相對類似的型態：月平均薪資接近勞動生產力（雖然在不同時期，二者呈現領先或落後彼此的情況）。不同的是，臺灣除了在 1990 年代初期（約 1990 至 1993 年）月平均薪資稍稍高過其勞動生產力，其餘年份月平均薪資都低於其勞動生產力。特別要注意的是，雖然 1980 年代與 1995 年以後，其月平

<sup>19</sup> 香港統計局只針對所有選定行業主類（而非所有行業）每季發表平均每月薪金，因此我們參考香港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表 6：按行業主類劃分的平均薪資」中「所有選定行業主類的平均每月薪金」的數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1980-2012），再取四季的平均來代表香港的薪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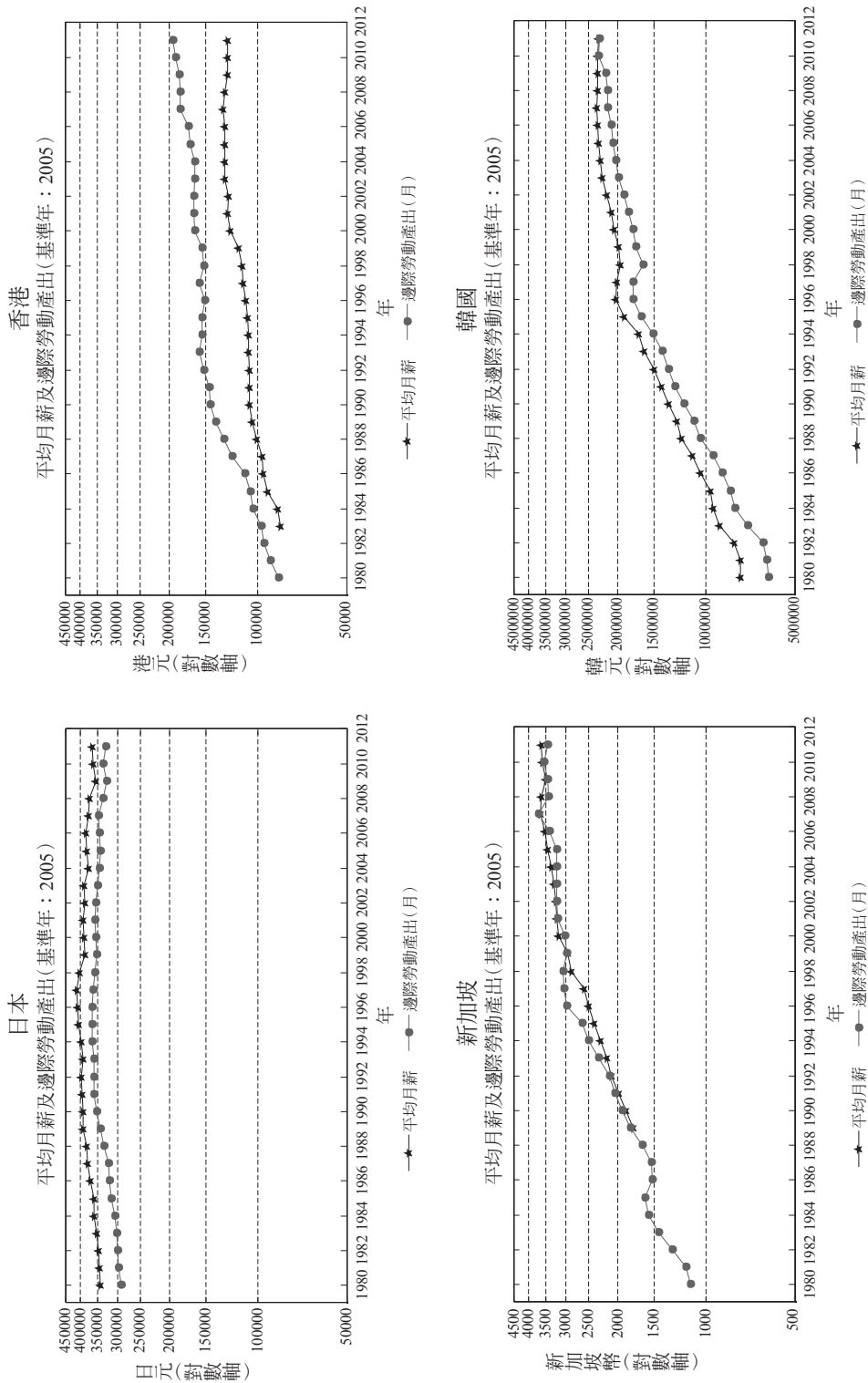


圖 7：四國平均月薪及每人邊際勞動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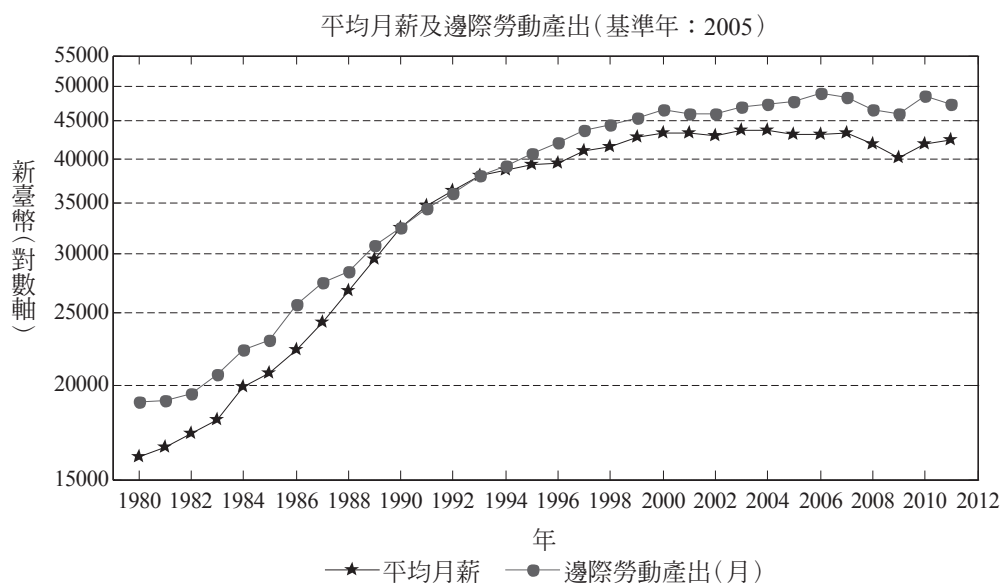


圖 8：臺灣平均月薪及每人邊際勞動產出

均薪資都低於勞動生產力，然而 1980 年代處於「迎頭趕上」的時期，1995 年以後卻呈現「逐漸落後」的情況。兩變數的差異於 1995 年後逐漸擴大，尤其在 2005 年後，月平均薪資對每月每人邊際勞動產出的比率降至 90% 以下。

透過圖 9，這個差異就更顯得清楚。圖 9 表示，1990 年代中期後，臺灣的月平均薪資對勞動生產力比一路下滑；而新加坡的波動呈現上揚的趨勢。就這一點而言，1995 年後，臺灣的情況似乎走向香港的路：勞工的平均薪資不但落後其付出的生產力，而且這個落後有持續擴大的趨勢。整體而言，臺灣的月平均薪資成長停滯，除了反映每人邊際勞動產出成長的減緩外，也反映月平均薪資的調整緩於每人邊際勞動產出的調整。

為何於 1995 年之後臺灣的平均薪資不但低於勞動生產力，而且有逐漸擴大的趨勢？Haep and Hsin (2016) 針對這個問題提供了兩個潛在的理由。其一是臺灣的資方具有相當高的獨佔力，而勞方的談判力量卻相對薄弱（工會力量小），這使得實質薪資不但低於勞動生產力且兩者的差距逐漸加大。其二，臺灣近幾年的就業保護政策（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增加了廠商的勞動成本，進而促使廠商壓低勞工的薪資（相關說明可參見 Lin,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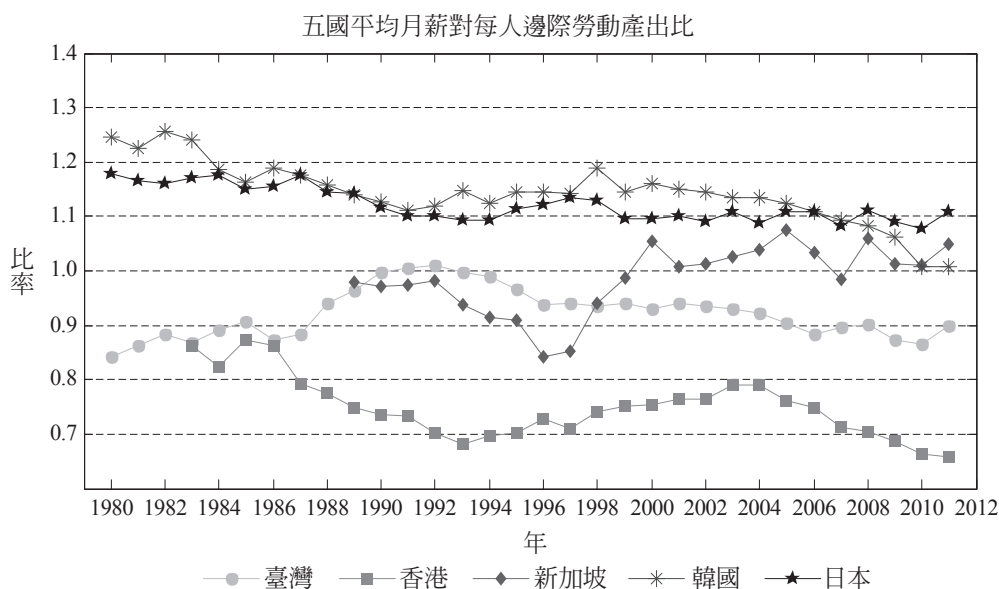


圖 9：五國平均月薪對每人邊際勞動產出比

## 陸、臺灣產業的薪資走勢

為進一步了解臺灣勞工薪資在不同產業的差異，本節將更仔細地分析臺灣各重要產業近年平均薪資及經常性薪資（與時薪特性較相似）的變動。同第肆及第伍節，本節所提及之平均薪資及經常性薪資皆為實質薪資。

首先，我們觀察工業及服務業部門實質薪資的近年走勢（見圖 10）。結果顯示，不論平均薪資或經常性薪資的成長皆可大略地以 1992 年及 2002 年為界，分為三階段：<sup>20,21</sup> 即薪資年平均成長率大於 5% 的第一階段、約以 2% 成長的第二階段，與衰退至小於 0.2% 甚而為負年成長率的第三階段（數值請參見表 6）。臺灣工業及服務業的薪資歷經成長漸緩，進而停滯。近年除工

20 分隔點的取得乃依照 Bai and Perron (1998) 的方法，估計薪資在截距或時間趨勢上的結構改變點，經檢定後可分為表 6 所標示的三個時期。

21 根據勞動部 (2014) 的定義，經常性薪資指「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金及全勤獎金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時價折值計入；以上均不應扣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平均薪資指「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薪資總數÷受僱員工總人數」。



業部門的平均薪資有微幅成長（年平均成長率為 0.16%）外，服務業的平均以及兩部門的經常性薪資更呈下降之趨勢。就臺灣兩個主要的部門而言，當今薪資困頓之窘境實非一日之寒。

在此大趨勢下，就表 6 及圖 10 中仍有數個值得觀察的重要特徵：一、工業部門的薪資低於服務業（無論經常或平均），其年成長率在第一階段及第三階段高於服務業，但在第二階段低於服務業。二、工業部門的薪資成長在 1990 年前較 1990 年後快，但成長的趨勢維持到 2007 年（較服務業部門

表 6：各類別薪資之年平均成長率

薪資類別	經常性薪資		平均薪資	
	工業	服務業	工業	服務業
全時期：1980-2011	3.04%	2.54%	3.33%	2.86%
第一階段：1980-1992	6.85%	5.41%	7.30%	6.45%
第二階段：1993-2002	1.69%	2.15%	1.57%	1.66%
第三階段：2003-2011	-0.38%	-0.77%	0.16%	-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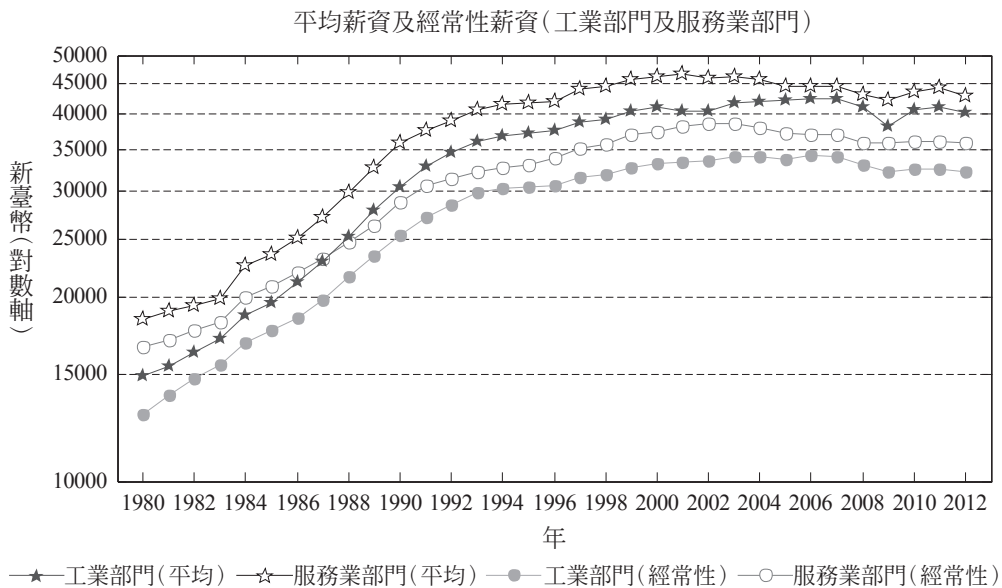


圖 10：平均薪資及經常性薪資（工業部門及服務業部門）

晚)；然而在 2007 與 2009 年間仍同服務業呈現下降的趨勢。三、雖然工業及服務業的薪資在 2009-2011 年已微幅反彈，但 2011 年的水準仍低於 2007 年的水準。

我們從平均薪資與經常性薪資的相對變動觀察工業及服務業薪資的特性。資料顯示(如圖 11)，服務業部門自 1990 年代中葉到 2002 年呈明顯下降趨勢，之後的比例則相對穩定；2009 到 2011 年更呈上漲的趨勢。就工業部門而言，1986 到 2011 年間大部分呈現上揚的走勢。上述的相對變動顯示 1987 到 1998 年服務業部門非經常性薪資相對於經常性薪資的加成較工業部門大，然而在 2000 年以後工業部門則加重薪資中非經常性薪資相對於經常性薪資之加成。上述現象，亦反映在服務業與工業經常性薪資及平均薪資的比值(如圖 12)。

雖然服務業無論是平均還是經常性薪資均較工業為高，圖 12 顯示，服務業薪資對工業薪資的比值逐漸變小。其中，服務業與工業的平均薪資在 2005 到 2008 年時最為接近。此外，經常性薪資的服務業對工業的薪資比在 2001 年以後高於平均薪資的服務業對工業的薪資比，這呼應上一段平均薪資對經常性薪資比的結論——服務業對非經常性薪資加成的依賴程度逐漸減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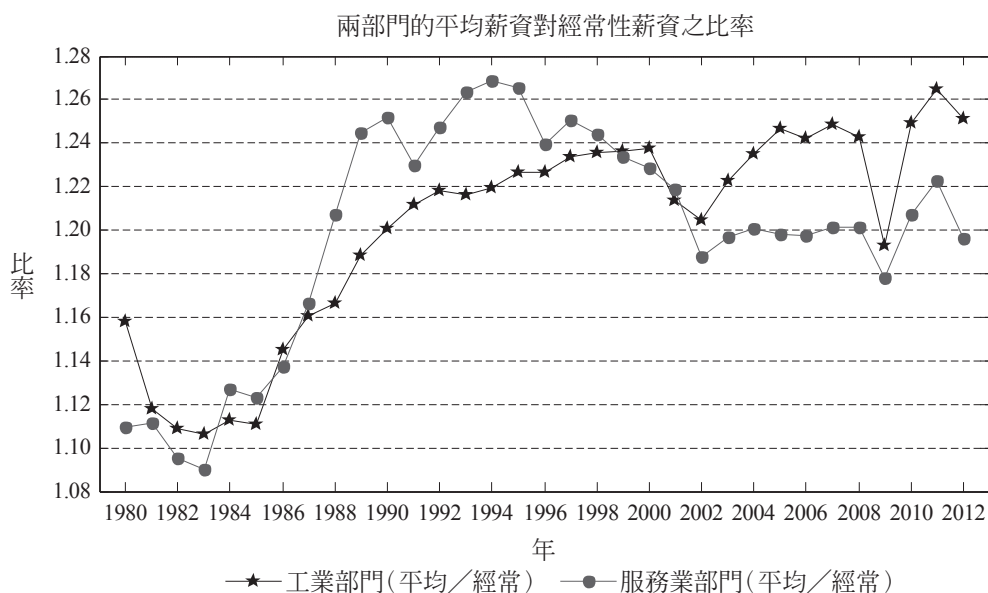


圖 11：兩部門的平均薪資對經常性薪資之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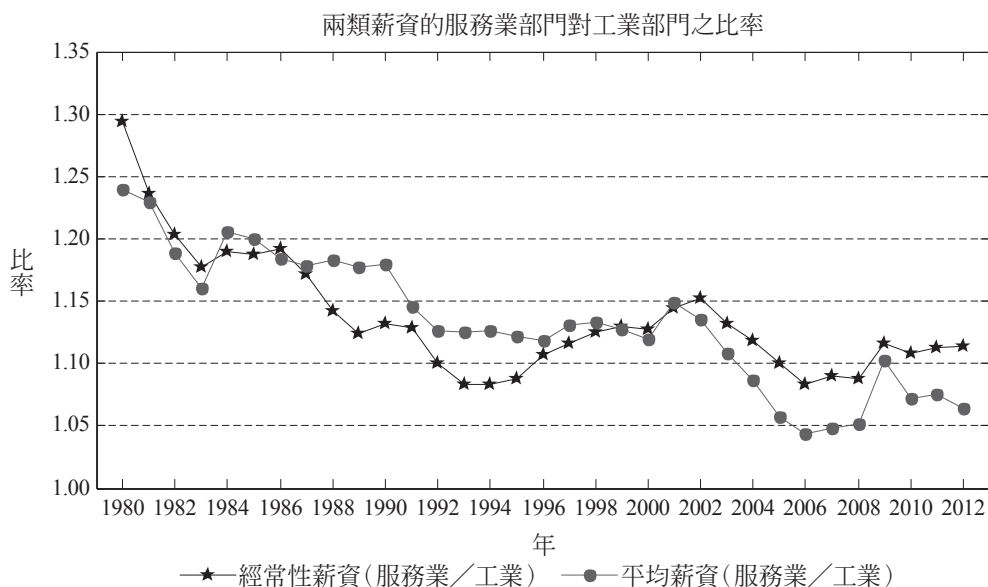


圖 12：兩類薪資的服務業部門對工業部門之比率

工業卻加劇。因此在圖 12 中，服務業對工業經常性薪資的比值與兩者平均薪資的比值在 1999-2001 年間呈現交叉。

除上述工業及服務業整體的變動外，各大業部門（指主計總處所定義的標準行業分類中的大類，共 19 個部門）經常性薪資（參見圖 13）與平均薪資（參見圖 14）也有不同的變化。就薪資高低來說，我們把焦點放在最大的大類行業別：製造業，及近年來薪資最高的兩大產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與金融及保險業。資料顯示，製造業的經常性薪資和平均薪資雖不高，但穩定成長的趨勢維持至 2000 年代中葉；金融業的經常性薪資和平均薪資較製造業高，但薪資起伏也較製造業大，例如 2008 年受到金融危機影響而明顯地下降。最後，在 1990 年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的經常性薪資和平均薪資與其他各業差距擴大，薪資水準領先其他產業並繼續穩定成長直至 2000 年代初期。

就變動量來說，多數行業部門經常性薪資的變動小於平均薪資（唯住宿及餐飲業為例外）。<sup>22</sup> 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雖然負成長率零星地在 1980

22 變動量所指的是每年的成長率。我們根據圖中數列的數值計算成長率，結果顯示，經常性薪資各大業年成長率的範圍小於平均薪資各大業年成長率的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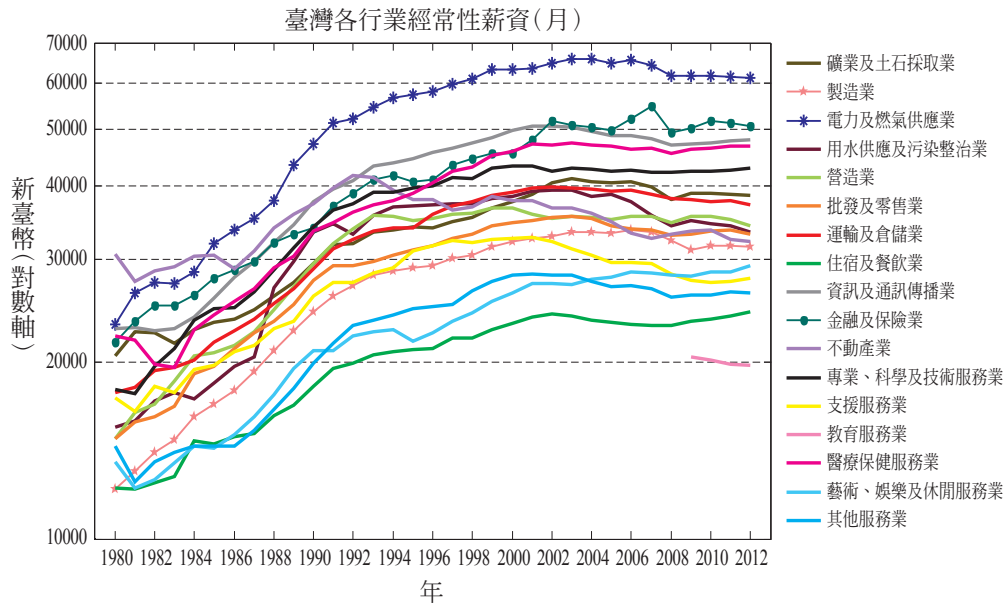


圖 13：臺灣各行業經常性薪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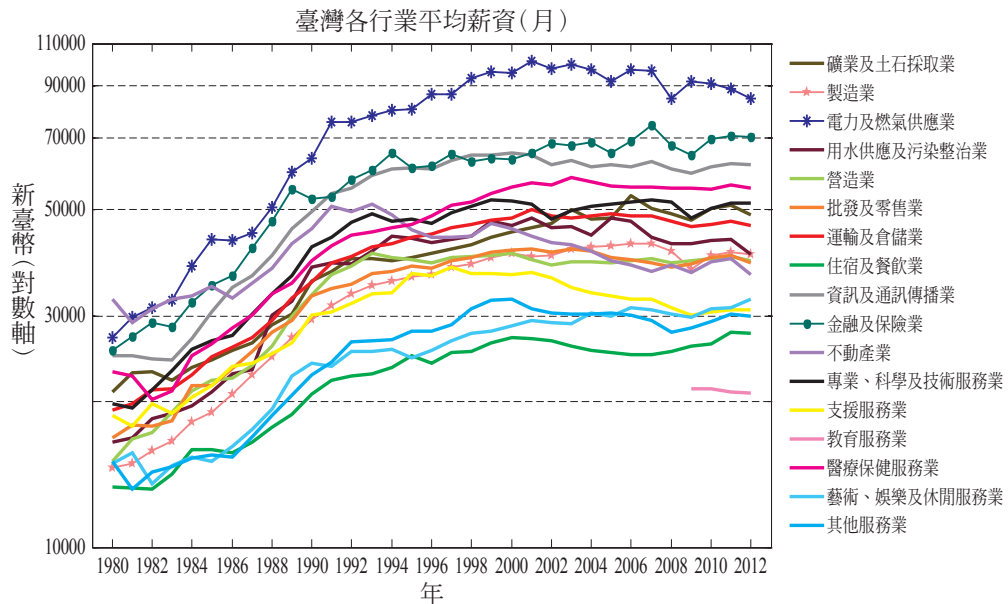


圖 14：臺灣各行業平均薪資

及 1990 年代出現於不同產業，但就經常性薪資而言，負成長在 2004 年後即成爲橫跨不同產業的普遍現象；就平均薪資而言，普遍的薪資負成長則早於 1990 年代中葉出現（及 2000-2009 年）。這結果證實平均薪資較經常性薪資容易更快反映廠商的薪資決策，且一旦負向的平均薪資成長已成常態，也會開始影響經常性薪資。或許，2000 年後長期的非經常性薪資縮水（反映在平均薪資上）與接續下降的實質經常性薪資，使一般社會大眾認爲薪資有停滯（或衰退）的現象。

## 柒、經濟意涵與未來研究議題

爲了瞭解臺灣勞動薪資的變化，本文從總體經濟學的文獻中提出三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臺灣的勞動與資本所得分配是否惡化了？我們的資料顯示，臺灣的勞動所得份額的確下降了，而且下降之幅度爲亞洲四小龍之最。自 1995 年開始，我國的勞動所得份額即快速下降，直到 2007 年這個下降才逐漸趨緩。另一方面，高速成長中的中國大陸與成長趨緩而成熟的日本都有類似一路下滑的走勢。就穩定成長的新加坡而言，其勞動所得份額下降的幅度最少，但絕對水準卻最低（2011 年的勞動所得份額僅有 0.4394）。一般而言勞動者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資本家的邊際消費傾向則較低。當勞動所得份額降低時勢必影響國內消費，進一步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的效果。<sup>23</sup>然而我們的觀察顯示：勞動所得份額與經濟成長並非呈現單調關係。例如新加坡，較低的勞動所得份額似乎沒有影響其經濟成長的動能。到底是甚麼因素造成二者呈現非單調的關係？這值得我們更深入地研究及探討。

第二個問題是，臺灣的實質薪資是否與所得成長脫鉤了？就時薪而言，臺灣實質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相關係數與鄰近之其他國家相似，並沒有呈現特殊的連動關係。然而，就平均薪資成長趨勢的連動性來看，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連動明顯呈現負向關係。在亞

23 針對臺灣 1981 到 2006 年進行觀察，陳畊麗（2008）發現勞動份額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約使民間消費減少 0.75%~0.90%，而對於國內總需求之影響約在 -0.63%~0.76%。

洲四小龍中，只有香港與臺灣呈現如此的連動，而臺灣的負向相關更甚於香港。在這樣的成長趨勢下，平均薪資（包含非經常性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負向連動，可能正是臺灣人民薪資停滯的感受來源。我們的資料更進一步顯示，自 2004 年以後，不論在衰退或者復甦期，我們的平均薪資似乎存在某種程度的僵固性。不同於過往，為何臺灣近期（2001-2012 年）的實質平均工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呈現背道而馳的現象？平均工資產生僵固的原因為何？這些都將是我們未來很好的研究議題。

第三個我們提出的問題是，臺灣的廠商是否針對勞動生產力提供合理的勞動報酬？再一次地，我們發現，在實質時薪上，臺灣並沒有特別不同於其他亞洲四小龍之處。就平均月薪而言，雖然薪資大部分的時期都低於勞動生產力，但其中歷經 1980 年代的迎頭趕上，到 1990-1993 年的超越期，而自 1995 年起節節落後。這個趨勢上的反差，可能是民眾對此感觸較大的原因之一。為何於 1995 年之後臺灣實質薪資不但低於勞動生產力，而且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我們必須藉由適當的經濟模型進行檢定。

臺灣的薪資停滯嗎？這是一個複雜且可能具有某種主觀判斷的問題。要適當地回答這個複雜的問題，客觀地陳述資料以及呈現議題是首要的前置工作，這也是本論文的主要任務。依循總體經濟學的角度檢視這個問題，本論文已經發現(i)自 1995 年之後，臺灣之勞動所得份額以相對快的速度（相對其他亞洲四小龍）下降，但是此下降幅度仍低於高成長的大陸，且絕對水準也高於穩定成長的新加坡；(ii)臺灣的平均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呈現負向相關，香港（本文估計）以及文獻上所提及的加拿大與紐西蘭也都有此負相關；(iii)自 1995 年之後，臺灣的平均薪資低於勞動生產力，且二者之差距正在擴大中。這個現象與香港相同，卻與韓國及新加坡大大不同。很明顯地，以上三個角度都指出了臺灣薪資停滯的現象。更困難的工作仍未完成：造成臺灣勞動所得份額下降以及平均薪資低於勞動生產力，並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負向連動的原因是甚麼？它們有共同的原因嗎？

然而，從跨國分析中我們也發現這三個角度未必有一致性的經濟意涵。例如，勞動所得份額低未必不利於經濟成長（以新加坡為例）；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未必能夠落實（trickle down）到勞工的身上，提高其薪資（從臺灣、

香港、加拿大及紐西蘭的薪資與實質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相關係數可以發現)。在臺灣，企業儲蓄不但相對較高(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17%，而 G7 的平均值約 10%)，<sup>24</sup> 而且上升的幅度相當大(企業儲蓄佔國民儲蓄增加了 36%，由 2007 年的 37.19% 增加至 2013 年的 60.92%)，卻沒有回饋到員工薪資上。低於勞動生產力之薪資，也未必能夠產生勞動成本減少的效果，嘉惠於經濟成長(以臺灣或香港為例)。這些資料提供了我們一些初步但重要的觀察方向。

最後，依據跨國的綜合觀察，我們提出相關政策意涵以及薪資政策探討。就勞動所得份額而言，亞洲四小龍中，香港勞動所得份額上升，而新加坡持平並逐漸上升。南韓與臺灣則下降，且臺灣下降的趨勢更為劇烈。就平均薪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連動性而言，近期二者在臺灣呈現強烈反向變動之趨勢。就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而言，1990 年代之後臺灣與香港的工資不但低於勞動生產力且差距持續擴大中。雖然臺灣的工資問題特別險峻，南韓與香港也有各自的問題，其原因更是錯綜複雜。

OECD (2006) 提出勞動市場彈性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以及勞動與工資政策 (labor and wage policies) 兩個因素，可以解釋大部分工資的變化以及失業的狀況。底下，我們從這兩個方向提出綜合性的討論。首先，依據 Botero et al. (2004) 的定義，勞動市場彈性包含規範員工僱用關係(就業保護政策及解僱員工的規範等)、勞資關係(工會的團體協商、員工自由參與工會的規範、罷工權行使的規範等)以及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社會福利制定及工作條件的彈性等)。臺灣與南韓都列為低彈性且高保障的勞動市場(見李誠，2007)。因較為國際化，新加坡與香港則列為高彈性的自由市場。有趣的是，這兩個高彈性的自由市場其勞動所得份額反而上升；而香港自由市場的彈性也使得工資低於勞動生產力的趨勢愈來愈明顯。相反地，南韓相對強勢的工會則使得工資高於勞動生產力(Yoon, 1999)。在臺灣，僵固的勞動市場以及較強的就業保護政策，使廠商勞動成本增加，進而低薪僱用勞工(Haep and Hsin, 2016)，導致勞動所得份額大幅下降，且工資低於勞動生產力的現

24 資料來源：臺灣資料取自 Fan and Kalemli-Özcan (2016)，而 G7 資料則取自 IMF (2006)。

象也日益明顯。

有鑑於各國有各自的工資問題，亞洲四小龍都有其提升薪資的做法。在南韓，所謂就業分享稅額抵扣（job sharing tax credit）政策，是針對加薪幅度高於過去三年平均薪資增幅的中小企業，可減免加薪人事支出 10% 的稅額（大企業為 5%），並且針對握有龐大現金準備（企業儲蓄）而未將淨利一定比例之金額投入於未來投資、發於股利或加薪的大型企業，課以加重 10% 的稅負。這個政策可能的成效係與南韓薪資及國內生產毛額間正向連動的現象一致。在新加坡，所謂的新加坡加薪補貼計畫（wage credit scheme）規定，若企業針對月薪 4,000 星幣（約 9.6 萬新臺幣）以下的員工加薪，將直接給予僱主四成的補貼。臺灣政府目前施行所謂「加薪四法」，中小企業員工加薪或新聘員工，可於當年度就其新增費用加三成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香港目前雖然沒有具體的加薪政策，但也朝這個方向努力中。針對梁振英 2016 年的施政報告，工聯會建議推動僱主放棄「壓抑工資」的營商手法，並規定在職人士每年享有帶薪之培訓假期。

就最低工資法而言，臺灣（於 1984 年起）與南韓（於 1988 年起）較早實行最低工資法；香港一直到 2011 年承認「工資保障運動」失敗後，才開始規定最低工資水準；新加坡則是唯一沒有實行最低工資法的國家。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加坡還是一個奉行自由市場規則的國家。根據三個角度的觀察結果，新加坡似乎也是相對工資問題較小的國家（勞動所得份額上升，薪資則逐漸高於勞動生產力且與國內生產毛額呈正向連動）。當然，這些發現或看法都未涉及所得分配的問題。

必須強調的是，為回應本文所發現以及引申的研究議題，未來我們需要更精確且嚴謹的經濟模型（總體以及計量模型），幫助我們一一檢視這些勞動市場結構與政策如何影響不同國家不同的薪資表現。



## 參考資料

### A. 中文部分

于國欽

- 2013 〈薪資失落的 16 年——薪資大倒退 四小龍台灣最慘〉。中時電子報，2013 年 9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930000046-260210> (Yu, Kuo-chin, 2013, “The Lost 16-years of Wages—Significant Wage Fall: Taiwan Is the Worst among the Four East Asian Tigers,” China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30, 2013, from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930000046-260210>)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013a 〈國內生產毛額依支出分——年（1981 以後）〉。2014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3a, “Expenditures 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Annual (since 1981),” Retrieved March 29, 2014, from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
- 2013b 〈每人每月薪資依部門別——年〉。2014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5/EarningAndProductivity/Default.aspx>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3b,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by Industry—Annual,” Retrieved March 29, 2014, from <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5/EarningAndProductivity/Default.aspx>)
- 2013c 〈經常性薪資依部門別——年〉。2014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5/EarningAndProductivity/Default.aspx>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3c, “Average Regular Earnings by Industry—Annual,” Retrieved March 29, 2014, from <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5/EarningAndProductivity/Default.aspx>)
- 2015 〈國內生產及要素所得——年〉。2016 年 7 月 28 日，取自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5, “Domestic Product and Factor Income—Annual,” Retrieved July 28, 2016, from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

李長泰、方俊德

- 2015 〈台灣勞動生產力與薪資脫勾之成因〉，發表於台灣經濟學會 2015 年會。臺北：臺灣大學。(Li, Chang-tai and Chun-te Fang, 2015, “The Causes of the Decoupling of Taiwan’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Wages,”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s 2015.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李 誠

- 2007 〈高保障、低彈性的台灣勞動市場：法律的幻象？〉，《台灣經濟論衡》5(9): 70-89。(Lee, Joseph S., 2007, “High Security, Low Elasticity of Taiwanese Labor Market: The Illusion of Law?” *Taiwan Economic Forum* 5(9): 70-8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 1980-2012 〈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1980 年第 1 季到 2012 年第 4 季，2014 年

3月31日，取自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10\\_tc.jsp?productCode=B1050009](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10_tc.jsp?productCode=B1050009)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1980–2012, “Quarterly Report of Wage and Payroll Statistics,” First Quarter 1980 to Fourth Quarter 2012, Retrieved March 31, 2014, from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10\\_tc.jsp?productCode=B1050009](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10_tc.jsp?productCode=B1050009))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

2014a 〈AREMOS 台灣經濟統計資料庫〉。2014年2月25日，取自 <http://net.aremos.org.tw/> (Taiwan Economic Data Center, 2014a, “AREMOS Taiwan 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bank,” Retrieved February 25, 2014, from <http://net.aremos.org.tw/>)

2014b 〈IMF 國際金融統計 (IFS) 資料庫〉。2014年3月31日，取自 <http://net-imf.tedc.org.tw/> (Taiwan Economic Data Center, 2014b,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Databank,” Retrieved March 31, 2014, from <http://net-imf.tedc.org.tw/>)

張車偉、張士斌

2012 〈中國勞動報酬份額變動的「非典型」特徵及其解釋〉，《人口與發展》18(4): 2-13。(Zhang, Ju-wei and Shi-bin Zhang, 2012, “The Change of China’s Labor Share: Non-stylized Fact and an Explan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8(4): 2-13.)

陳崐麗

2008 〈台灣中期經濟成長與收入分配結構之計量分析〉，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劃處 (編)，《綜合規劃研究》，頁165-194。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Chen, Keng-li, 2008, “Econometric Analysis for Taiwan’s Mid-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p. 165–194 in Department of Planning,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ed.), *Planning Research*.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陳香如、郭哲瑋

2014 〈台灣薪資停滯之可能原因與解決方式〉，見經濟日報 (編)，《2014年經濟年鑑》，頁32-39。臺北：經濟日報。(Chen, Hsiang-ju and Che-wei Kuo, 2014, “The Possible Causes and Solutions for Taiwan’s Wage Stagnation,” pp. 32-39 in Economic Daily News (ed.), *The R.O.C. Economy Yearbook 2014*. Taipei: Economic Daily News.)

勞動部

2014 〈工資工時統計〉。2014年5月19日，取自 <http://statdb.mol.gov.tw/html/com/st0302.htm> (Ministry of Labor, 2014, “Wage and Hour Statistics,” Retrieved May 19, 2014, from <http://statdb.mol.gov.tw/html/com/st0302.htm>)

黃登興

2015 〈台灣薪資停滯現象解析——全球化貿易與投資夥伴〉，《社會科學論叢》9(1): 33-58。(Huang, Deng-shing, 2015, “On the Wage Stagnation of Taiwan: Trade and FDI Partners under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9(1): 33-58.)

黃登興、劉碧珍、楊子茵

2014 〈台灣實質薪資的停滯現象：全球趨勢與台灣特徵〉，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學術研討論文，No. 14-A012。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Huang, Deng-shing, Bih Jane Liu, and Tzu-han Yang, 2014, “The Phenomena of Taiwan’s Real Wage Stagnation: Global Trend and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 IEAS Working Paper No. 14-A012. 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葉懿倫

- 2011 〈「經濟成長，薪資不漲」理由何在？從經濟成長構成觀點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4(9): 103-111。(Yeh, I-lun, 2011, “Why Grow with Wage Stagnat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osite of Economic Growth,”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Monthly* 34(9): 103-111.)

詹建隆

- 2011 〈以勞動生產力解析台灣薪資問題之成因〉，《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4(9): 112-120。(Chan, Chien-lung, 2011,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aiwan’s Wage Issues Using Labor Productivity,”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Monthly* 34(9): 112-120.)

劉碧珍、楊子茵、黃登興

- 2014 〈影響台灣勞動份額變動因素之探討〉，發表於台灣經濟學會 2014 年會。臺北：東吳大學。(Liu, Bih Jane, Tzu-han Yang, and Deng-shing Huang, 2014, “Explo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bor Share Changes in Taiwan,”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s 2014. Taipei: Soochow University.)

## B. 外文部分

Akerlof, George A. and Janet L. Yellen

- 1990 “The Fair Wage-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2): 255-283.

Arpaia, Alfonso and Karl Pichelmann

- 2008 “Falling Wage Shares: A Common Trend?” pp. 28-41 in Peter Mooslechner and Ernest Gnan (eds.), *Dimensions of Inequality in the EU*, Proceedings of OeNB Workshops, Paper No. 16. Vienna: Oesterreichische National Bank.

Bai, Jushan and Pierre Perron

- 1998 “Estimating and Testing Linear Models with Multiple Structural Changes,” *Econometrica* 66(1): 47-78.  
2003 “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of Multiple Structural Change Model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8(1): 1-22.

Barsky, Robert B. and Gary Solon

- 1989 “Real Wag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888.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ecker, Gary S.

- 1975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tero, Juan C.,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 2004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4): 1339-1382.

Datastream

- 2014 “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Online),” Retrieved February 25, 2014, from <http://financial.thomsonreuters.com/en/products/tools-applications/trading-investment->

- tools/datastream-macroeconomic-analysis.html
- Diwan, Ishac  
2001 "Debt as Sweat: Labor,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Fan, Jingting and Şebnem Kalemli-Özcan  
2016 "Emergence of Asia: Reforms, Corporate Savings, and Global Imbalances," *IMF Economic Review* 64(2): 239-267.
- Feenstra, Robert C.,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2015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10): 3150-3182.
- Gärtner, Manfred  
2009 *Macroeconomics*, 3rd ed. Harlow, UK: Pearson Education.
- Gollin, Douglas  
2002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2): 458-474.
- Guscina, Anastasia  
2006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IMF Working Paper No. 06/294.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Haepf, Tobias and Ping-lung Hsin  
2016 "Is Taiwan's Workforce Underpaid? Evidence from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Estimates at the Company Leve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8(2): 299-331.
- Hart, Robert A., James R. Malley, and Ulrich Woitek  
2003 "Manufacturing Earnings and Cycles: New Evidence," Working Paper 2002\_16. Scotland, UK: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lasgow.
- Heng, Toh M., Adrian Choo, and Terence Ho  
2003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Singapore'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Survey of Singapore* 2003(1): 51-75.
- Huang, Kevin X. D., Zheng Liu, and Louis Phaneuf  
2004 "Why Does 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Real Wages Change over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4): 836-856.
- Hwang, Deok S.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Share and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in Korea and OECD Countries," Korea Labor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jong-si, KR: Korea Labor Institute.
- Ilmakunnas, Pekka and Mika Maliranta  
2005 "Technology, Labour Characteristics and Wage-productivity Gap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5): 623-645.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6 "Awash with Cash: Why Are Corporate Savings So High?" pp. 135-159 in IMF (e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ization and Inflation, April 2006*.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Kaldor, Nicholas  
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67(268): 591-624.
- Kandil, Magda  
2005 "Countercyclical or Pro-cyclical Real Wages? A Disaggregate Explanation of Aggregate Asymmetry," *Empirical Economics* 30(3): 619-642.
- Karabarbounis, Loukas and Brent Neiman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1): 61-103.
- Keynes, John M.  
1939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The Economic Journal* 49(193): 34-51.
- Krämer, Hagen  
2011 "De-Composition of the Labour Share of Income: Th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in Selected Advanced Economies," Mimeo. Karlsruhe, GER: Karlsru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 Krueger, Anne O.  
1997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We Lear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1): 1-22.
- Lazear, Edward P.  
1979 "Why Is There Mandatory Retir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6): 1261-1284.
- Lin, Yen-ling  
2013 "Wage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n Taiwan,"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7(2): 145-161.
- Lu, Shu-shiuan  
2012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Revisi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Neoclassical Model,"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5(3): 359-376.
- Maarek, Paul  
2012 "Labor Share,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No. 38756.
- Mankiw, Greg  
2006 "How Are Wages and Productivity Related?"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16, from <http://gregmankiw.blogspot.tw/2006/08/how-are-wages-and-productivity-related.html>
- Messina, Julian, Chiara Strozzi, and Jarkko Turunen  
2009 "Real Wag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OECD Evidence from the Time and Frequency Domain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3(6): 1183-1200.
- Mincer, Jacob A.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for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pp. 207–231 in OECD (ed.),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6*. Washington, DC: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Prescott, Edward C.  
1998 “Lawrence R. Klein Lecture 1997: Needed: A Theory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9(3): 525–551.
- Qi, Hao  
2014 “The Labor Share Ques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65(8): 23–35.
- Research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5 “Four Pillars and Six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Review and Outlook,” *Research Brief*, Issue No. 3, 2014–2015.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16, from <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1415rb03-four-pillars-and-six-industries-in-hong-kong-review-and-outlook-20150209-e.pdf>
- Ro, Chung K.  
1995 “A Study on Labor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State: 1987–1992,”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Seoul, K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 Solon, Gary, Robert Barsky, and Jonathan A. Parker  
1994 “Measuring the Cyclicalities of Real Wages: How Important Is Composition Bi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1): 1–25.
- Solow, Robert M.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312–320.
- The World Bank  
2014 “GDP (current US\$),”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Retrieved February 25, 2014, from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 Yellen, Janet L.  
1984 “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Unemploy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2): 200–205.
- Yoon, Bong J.  
1999 “Why Is Labor So Militant in South Kore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Working Paper Series Vol. 99–24. New York: Binghamton University.
- Zavodny, Madeline  
1999 “Unions and the Wage-Productivity Gap,” *Economic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84(2): 44–53.

# Wage Stagnation? Fact Disclosure and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Chang-chi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Juin-jen Chang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Shu-shiuan L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re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macroeconomics literature, and com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wage stagnation. First, we explore the trend of labor income shares, namely the labor income-output ratios, in Taiwan. This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r trade-off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shares. Second, we calculat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real wages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showing that whether Taiwan's real wages and national income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ird, we calculate the gap between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and real wage. This focus shows whether workers' salary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productivity in Taiwan.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all issues we compare the Taiwan cas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sia. By these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we examine whether the wage stagnation in Taiwan is unique, or common in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labor share, comovement of real wage and GDP per capita, difference between wages and productivity

